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内源性”生成机制探析

——从越文化视阈的透视

王嘉良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固然不可或缺，但“传统内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越文化“近传统”蕴含的叛逆道统、注重变革的精神，曾长期影响我国的思想文化界；越地的面海区位优势，养成作家外向拓展的精神品性，造就内外共振的文化效应；而越文化在传统格局中的新变，也形成一种历史流转的文化精神。这些特征，恰好与越地作家群体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卓越建树形成同构对应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越文化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内源性”机制。

关键词 越文化；近传统；小传统；新变精神

中国文学在历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至“新文学”起发生激变，无论是文学观念抑或是文本样式，都实现了由旧向新的整体性变革。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外源性”因素固然不可或缺，但中国“传统内”的因素同样不能低估。有学者指出：“在现代中国，国外鼓动的革新仍必须作为‘传统内的变化’而出现。因为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仍然是在继承下来的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的。”^[1]联系中国文化传统中极具变革精神的越文化传统，对照在越地生成的由鲁迅领衔的阵容壮观的新文学作家群^[2]，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思考，当能有效阐释文学转型的诸多要素。诚然，从地域文化视阈视之，我国各地的地域文化都蕴含了许多文学转型的质素，但越地文化的“典型性”十分突出。本文从我国文学传统中的“近传统”“小传统”及与此相关联的“内源性”质素中，探寻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力，以阐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其有效路径。

一 越文化“近传统”的意义： 启蒙传统的现代延续

论说越文化传统，应该有“远传统”与“近传

统”两重研究视角。“远传统”大抵是指古越文化有久远历史，越人自古以来就不乏自强不息、耻为人后的精神。王思任所谓“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便是越人向来引以自傲的。鲁迅对此有更精当的概括：“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3]这说明梳理越文化的源头及其后的“善生俊异”，当是观照越地文化发展的一个可取视角，可以体现“远传统”的越文化精神已积淀为本地域的一种重要思想文化资源。然而，若是就文学转型而言，仅此又是很不够的，不但仅从“远古”的影响寻觅传统的现代踪迹未免太过渺茫，便是单纯的“报仇雪耻”之类的文化命题也不足以构成对“文学”的直接影响，因而需要探寻传统中对后起思想文化更能产生广泛影响的精神原动力。

传统一旦形成，便在漫长历史中产生多重文化效应，为后世传承。美国学者希尔斯有言：传统作为历史的“物质积存”，是“几经筛选”才为人们接受的，因此“传统的进程也是选择的过程”^[4]。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传统的传承，是一个动态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人在“传统的进程”中

对其作出的现代性“选择”。从越文化发展走势看，如果考虑更多“人文因素”的作用，那么对于近现代浙江士人更具感召力因而也产生更直接影响的，应该说是其“近传统”。金克木认为，“从地域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和变化，既可分析其静态，也可考察其动态。这样，文艺活动的社会现象就仿佛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场’，可以进行一些新的科学的探索了”^[5]。就此而言，从动态历程考量，探讨越文化传统在近现代的传承，深究其“近传统”的价值显然是远比“远传统”更为科学也更产生直接效应的文化命题。

尽管越地所在的长江流域文明开发不晚于北方，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先后发掘，把中国历史推前了几千年，但由于僻居海隅，远离中原，该区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文人文学创作）起步较晚，一度与中原拉开很大差距，却是不争的事实。自先秦至两汉，中原腹地已有较为繁盛的文学景观，诸子散文竞相争雄，诗骚创作蔚为大观，魏晋时期则已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但越地基本上是沉寂无闻。越地文学及文化思潮的繁荣，是随着时势变迁、文化融合逐步形成的。在中国文化史上，经晋室南迁、唐末安史之乱和北宋靖康之难，中国文化中心曾有三次“南迁”，至南宋定都临安，浙江已处于“中国文化中心”地位。陈正祥认为，“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浙江杭州又成为了“江南的核心”^[6]。是故自南宋以来，中国东南（尤其是江浙地区）无论是哲学（理学）、文学、绘画还是书籍印刷，都曾独占鳌头。而标志着越文化传统的更新的，则是浙江启蒙文化思想的空前活跃。

越文化的现代价值，就学术史影响而言尤其体现为启蒙传统的现代延续。此种启蒙文化思潮以越文化“近传统”的文化场域为甚。宋明以来越地人才辈出、学派林立：由南宋开启的“浙东学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创事功学与心学两大体系，确立近代理性所需的务实精神和张扬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哲学理念，构成对汉儒经典的冲击，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至明清之际，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哲学与以黄宗羲

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促成事功学与心学合流，建构了一种兼具主体精神与事功精神的哲学理论体系，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与理学，鼓吹民族民主思想，使这里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活跃地区。由此产生的“浙东学派”，特别是王阳明心学，促进了明清以降启蒙思想的发展，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近代文化巨匠梁启超就认为，出于浙东的“残明遗献思想”处在当时的“文化中心”地位，其影响所及已然成为近代“思想界的变迁”的“最初的原动力”^[7]。近代以来，此地启蒙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特别是作为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风雷的呼唤者的龚自珍，其思想学识流布甚广，“风尚所趋，尊为‘龚学’……家弦户诵，遍于江浙”^[8]，且以其振聋发聩的“改革”呼声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界、文学界。对于“龚学”，梁启超也极为推崇：“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先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9]浙江近代启蒙文学一直呈持续递进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定庵思想的薪火相传；而当近代化过程加速，“近世思想自由”之风盛行，此种薪火相传的特点就得以进一步呈现。

越文化“近传统”的一个直接效应，便是此种以启蒙思潮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给处于急剧震荡中的近现代中国知识界以强大的思想、精神“原动力”，催生了一个以启蒙为己任的新文学作家群体，这可以说是对一种历史传统的承续，是文化启蒙思潮的一种蓄势已久的喷发。20世纪初，新一代浙江学人崛起，在日本东京创办《浙江潮》，从其间走出的鲁迅、周作人、蒋百里、许寿裳等人日后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臣。他们当时就“发大声于海上”，表达出以思想文化之力起区域而抗陆沉的强烈意愿：

乃读乡先贤哲学士大夫之遗书，其理想之高超，出乎天，天而入于人，人发为章，云蒸霞蔚，光怪陆离，我浙人以干政治界、哲理界、文艺界，其位置固何等乎？……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其果能担任其此言乎，抑将力不能胜任，徒为历史羞乎？^[10]

这里所说的“乡先贤”当指王阳明、黄宗羲、

龚自珍等光耀于世的浙籍文化先驱，而文明“中心点”显然是指从南宋以来越地曾居于“文化中心”地位，从中表露的正是他们自觉追踪同乡先哲，承传地域文化传统的强烈意愿。不妨说，对于前贤造就的文化传统的自觉接受意识，是新一代浙江学人紧紧抓住新世纪的机运而努力开拓新文学的原动力之一。由是观之，越地新文学作家对越文化传统的现代性“选择”更多地呈现在“近传统”中，而且思想启蒙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切入新文学建设也顺应了文学发展潮流。这只需举周氏兄弟为例便可印证。

鲁迅对地域文化精神的传承，基于自觉的传统接受意识。他在早年写出的论文中就表述过：匡救中国的“明哲之士”，应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1]。这“固有之血脉”中就包括两浙（特别是浙东）文化的“血脉”，所以两浙深厚的文化底蕴，对鲁迅始终有着不可名状的亲和力与感召力，其意识深处也便有无可抹去的“乡前贤”思想的印痕。从留日回国直至走出越中，鲁迅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理越文化典籍，投入“越学”整理工作，他所辑录的越地古籍《会稽郡故书杂集》即是其中一种，从中可以概见其运用越学资源阐释启蒙文化思想。他认为：“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而越地又“远于京夏，厥美弗彰”，致使珍贵史料多有散佚，他做这一项工作力求将“乡先贤”的言说收齐收全，目的是使“后贤为之纲纪”，乃至“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12]。这本古书杂集收录了范蠡、文种、王充、嵇康等多达72人的先贤事迹，其中谢承《后汉书》中对王充的记述尤为显豁，记载其曾受到“乡里先辈务欲衿夸”的事实，便含有汲取其“异端”思想的意义。鲁迅为编纂《嵇康集》历时23年（1913—1935）之久，不唯在于嵇康也有会稽的血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13]，更是由于看重这位先贤“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精神，对其反叛传统的思想之推崇溢于言表。他还有更宏大的“开拓越学”的计划，曾向好友许寿裳发出共同进行“越学”研究的吁请：“惟莫大山川，必巨斧凿……故

特驰书，乞临此校，开拓越学，俾其曼衍，至于无疆。”^[14]他决心以“巨斧凿”完成“越学”的编纂，对越地经史文化加以系统阐释，为“越学”的开拓与建构而努力。通过对“越学”的深入探究，我们对鲁迅怎样汲取越地文化资源，梳理越文化先驱的启蒙文化思潮，会有更清晰的认知。

另一个在新文学理论建构上卓有建树的人物是周作人。他对两浙人文传统也是推崇有加。其著名的《地方与文艺》一文中历数“近来三百年”的越地人文传统，勾勒自徐渭、王思任、张岱至袁枚、李慈铭、章学诚直至章太炎的浙籍文化先驱的成就，内中不乏叛逆道统的文人学士，自然也有鼓吹启蒙思潮的“浙东学派”健将。他称这一“异端”思潮的形成乃是中国“在文学进化上”的“很重要的一个时期”^[15]，其对“乡前贤”的推崇可谓溢于言表。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他甚至将中国新文学“源头”追溯到晚明，认为“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是“明末的新文学运动”的重演。这个说法能否成立固可存疑，但他指出急剧的社会变动带来思想文化与文学变革的可能性，却是颇具合理性的。他论述转型期文学思潮时经常使用“王纲解纽”的字眼，正如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家与文学家用“天崩地解”概括当时的文化新变。由于这种精神联系，在面对“五四”前后的思想解放潮流时，新文学作家承续前贤，再作思想启蒙的呐喊。

二 “小传统”地域的精神品性： 流动性和外向拓展意识

地域人文传统作为一种新文化的生成机制，对于新文学作家群体的生成至关重要，但这个群体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猝然爆发，还取决于这个文化传统的固有属性。越地以其“面海”的区位优势得风气之先，率先经受近代文明思潮的洗礼，使这一地域的文化精神——外向拓展意识，得以尽情展现。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阐述中国近现代史时，曾专设一节，论述“作为小传统的面海的中国”引领文化新潮的意义。他认为：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传统，即“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和“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

传统”，前者表现为先进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后者则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面海的中国是一条变革的渠道”，富有变革精神的“小传统”渐次获得生机，其释放的巨大能量日益改变着被“支配”的角色定位，日渐由“边缘”向“中心”位移^[16]。此说也许并不全面，但其概括了中国文化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内部结构的变化，用来说明“面海”的越文化传统与内陆“腹地”的“大传统”在近现代进程中不同的走势，还是颇具启示，可以解释越地何以能生成一支声势壮阔的新文学浙军。

“小传统”地域之所以富于文化生机，是由于“面海”的优势，同“大传统”的封闭性相对，它蕴涵着融通新机、因时而进的改革气度，因此当中国有可能向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时，这里就会获得变革的先机。越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特质是流动性与开放性。这是由特殊地理人文环境养成的独特文化品性。浙江地处海隅，濒东海、溯长江、环太湖，省内河道密布，对内对外交通都十分便捷。这便赋予浙人善于流动的地缘文化性格、外向拓展的文化基因与心理基因。此地的文人学士大抵不失“好动”习性，所谓“子弟胜衣能文词，父兄相与言，命束装负书，以行四方”^[17]，是对此的生动写照。这种外向拓展意识，有助于走出自我封闭，广纳异质文化，加厚加深自身的文化积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融通中产生良性互动关系。浙江既是此种文化互通的受惠者，在中原文化与边地越文化的交融中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中心，同时也推动作家走出浙江去异乡建功。较早从越地走出的著名文学家，是东汉的王充和西晋的嵇康，此后大诗人陆游等主要也是在外地建功。而且此种外向拓展，不独表现为本国“异乡”间的流动，还体现在中外文化交融中。浙江地处沿海，早在唐代已与日本、高丽诸国有频繁文化交流。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以宗教为主要载体输入西欧科学、哲学，杭州人李之藻、杨庭筠就成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二，也是中国最早的“西学派”成员；而客死异乡的明末“遗民和逆民”朱舜水，则将所学播扬到了东瀛，其“经世治民”学问在日本产生了持续影响，“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

影响，即于朱子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18]。

随着我国近代化进程的加速，越地作为中国一个重要对外窗口的区位优势充分凸显，其显著标志是“小传统”地域“城市—海上的思想”日益彰显。首先，是农业与手工业发展、市镇经济繁荣，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生长，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在逐渐解体^[19]。特别是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时，越地是首先被外国资本主义“叩关”的省份之一，继1844年宁波作为通商口岸正式开埠后，温州又于1877年开埠。浙江“海禁”既开，与之俱来的是“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20]，人们的意识观念随之作出调整。其次，浙江的近代民族工业已有相当规模，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内地省份，改变着浙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这一地域更有望在近代文化大潮中抢滩成功^[21]。汤震所著《危言》一书，刊于1890年，比康、梁的“公车上书”早五年，该书力主变法，主张创办铁路学堂、促进民族资本自由发展，因而受到决心变法的光绪帝的重视^[22]。再次，维新文化思潮给浙江文化领域带来新的变化，促成新式学堂和新学的盛行。维新人士张元济本着“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23]的宗旨，首办“西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推动了浙江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此同时，现代传播方式（现代报刊）应运而生，如1895年《杭州白话报》创刊，“旨在鼓吹新政”，在当时的白话文报纸中影响殊大^[24]。虽然百日维新最终破产，但这些文化成果大都保留了下来，这说明当时的浙江已在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酝酿着巨大的变动，还因“西学东渐”而获得了参与世界文化进程的良机。

19、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使越地的外向拓展意识获得张扬的机遇，催生了别开生面的浙江文学“新军”。一方面，国门既开，“面海”地域的人们率先获得了探头向外的条件；另一方面，异域新风的吹拂，也使他们率先感受到勇迎世界潮流实为当务之急。鲁迅便是因为国内难以满足其吸纳新知之所需，这才“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20

世纪之初，“走异路，逃异地”——离开故土，外出求知，甚或远涉重洋，成为浙江学人的一种急切而又自觉的选择。《浙江潮》曾刊登文章“急召浙江子弟出国留学”获取“新学”，文中将“出洋留学”定位为拯救地方和国家的根本性“策略”：“以广义言之，东京多一留学生，则将来建造新中国多一工技师。以狭义言之，东京多一浙江留学生，即将来建造新浙江多一工技师”，是故“救之之策，则造就人材是也。造之之策，则出洋留学是也”^[25]。如此明确的眼光向外的意识，在当时的国人中罕有其匹，这恐怕也是“小传统”地域才有的对于振兴民族方略的认知。

正是由于此种意识，当时出国留学成为浙江的一种风气。在这股“出国潮”中，从越地走出了中国新文学的两个留学生群体：一个是日本留学生群体，包括王国维、钱玄同、周氏兄弟、沈氏（尹默、兼士、士元）兄弟、郁氏（曼陀、达夫）兄弟、丰子恺、陈望道等；另一个是欧美留学生群体，包括徐志摩、梁实秋、林徽因、俞平伯、罗家伦、邵洵美、孙大雨、宋春舫、陆志韦等。这两个留学生群体，既是新文学“浙军”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中国新文学的中坚力量，开创了我国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新局面。

越地外向拓展的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使得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通成为自觉性行为，而文学新质的接受与开拓也由是而生。关于中国新文学的起源，周作人认为“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26]，这实际上恰是周氏自身文学经验的总结，唯其有“内应”与“外援”的并重，才有越文化精神驱动下内外感应的文化共振，这是越地新文学作家少有的识见与胆魄。鲁迅更是如此，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连发表《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以内、外两面都有所吸纳的姿态探讨文化命题，表现出他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敏锐感知。其时他已提出“立人”思想，主张“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进而提出“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就在于崇尚“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27]，这实开“五四”新文化思潮之先声。也正是由于有此积累，他才能够形成对文学革命的深邃思考。鲁

迅并非最早的文学革命发动者，但他早已深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人的精神，“提倡文艺运动”亦是其思索已久的构想。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极需要文学实绩的时候，鲁迅奉献给新文坛的第一篇作品便是《狂人日记》，一位新文学大师就此应运而生。

三 传统格局中的新变： 历史流转的文化精神

越文化诸种精神的累积，构成了一种鲜明特质，这便是：坚持求新、求变，敢于以反传统姿态突破固有格局，因时而进、随势更新，从而不断突破传统，实现文化更新。其实这种现象在越地的古代文学变革中就有明显表征。中国文学向来以诗文为“正宗”，以小说、戏曲为“邪宗”，而这一规则却在越地被打破了，南宋以来，浙江的话本、小说、戏曲、传奇的创作可谓极一时之盛，元、明、清三代最重要的戏曲家、小说家、曲词家往往出身浙江，其数量在全国首屈一指^[28]。这种格局的形成，与此地经济繁盛、商贾云集，文学日渐走向市民化与世俗化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文人们看到文学发展大趋势，不再信守“正统”文体规范。由此也足以证明，一旦传统文化观念成为严重束缚与桎梏时，便有革新力量予以扭转，这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历史流转的文化精神，在越地这尤其显著地表现于近现代文化的激变中。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前夜”，越地文人就有过一次出色的预演。在新文化思潮的激荡下，20世纪头十年，曾爆发一场由维新派作家发动的文学界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浙江作家虽未执文界革命之牛耳，但由于深受新思潮浸染，许多作家的文化观念已颇不同凡响。被梁启超称为“近世诗界三杰”的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是“诗界革命”的领衔人物，其中夏、蒋二位是浙江人。夏曾佑（穗卿）是近代“新学诗”的首倡者之一，其诗歌创作具有融“新学”知识和学理、名词入诗的特点。梁启超曾谓：“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29]“怪异”者，异

于时俗也，其诗作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已表露无遗。蒋智由（观云）的诗，也重在鼓吹新思潮、新学理，在“诗界革命”中引发强烈反响。时人评其诗云：“就‘新诗’论‘新诗’，当以蒋观云的成绩最可惊异”，“诗固不佳，而已成为时代的信号”^[30]。诗作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而蒋智由其时已力倡“文学自由”原则：“因自由于宗教界、于政治界、于学术界，无不破坏旧习惯，而开一新面目，文艺亦然。应用自由之一原理，遂得脱出古人种种之窠臼，文艺于是有新生命。”^[31]这一见解反叛旧传统、旧习惯，揭示文艺发展规律，在当时更属难能可贵。而这一时期鼓吹革命思潮、推动文界革命深化的代表性人物，则是章太炎。他此时已与维新派决裂，走上“排满革命”道路。其主持《苏报》《民报》期间发表的一系列与保皇党论战的文章，元气淋漓，所向披靡，名震海内外。他主张为改造当今社会，非“震以雷霆之声”不可，必“欲以跳踉搏跃言之”^[32]。故其所作之文，尽作“跳踉搏跃”之态，为文或恣肆汪洋、明快犀利，或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不独思想敏锐，形式上亦极富文学色彩。鲁迅评价章太炎时指出：“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33]。章太炎与后起的浙江新文学浪潮也有着甚深的传承关系，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都是章太炎的入门弟子。后来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受惠于新世纪初已经萌动的文学革新思潮。

论及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于“五四”新文学“前夜”的晚清文学是绕不过去的存在。五四与晚清，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新旧文学互相融合的区域。晚清的梁启超、黄遵宪等倡导“文学改良”、白话文的提倡与一度流行，乃至后来人们所说的晚清通俗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34]，都说明晚清文学也蕴涵了诸多文学新质。然而，文学的近代化变革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它的最终实现形态（“近代”形态），而在于它完成了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即为建构具有“现代”特质的新文学作出新质储备。以建设20世纪新文学的目标论，文学近代化体现的是承上启下、

除旧迎新的过渡性特点，它对古代文学体系形成冲击，并在文学体系各要素中都不同程度发生向“新文学”转化的变革，但它毕竟没有完全否定固有文学体系，尚未冲破传统的形式体制和语言模式，不可能具备全面改造中国文学传统的条件，因而最终并未造就“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新文学”体系的建构，还需要一场更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需要一批思想敏锐、目光如炬的新型的文学革命者。

就中国文学发展大趋势而言，越文化的近代变革造就了文学的诸多新质，最重要的意义是催生了一支文化新军，他们已开始向文学“现代”方向发起有力的冲击，这对于未来文学的发展构成不可或缺的要素：“新文学”时期能够形成声势壮阔的作家队伍，是基于这种积累；浙江作家在其后数十年保持在全国的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种积累。从20世纪初到新文学诞生以前，浙江新一代学人的崛起，还没有达到足以影响那个时代文化思潮、文学风气的程度；然而，这对于改变近代以来浙江作家队伍的整体结构，进而实现文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却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其中作家队伍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意识观念的调整，奠定了向现代转型的底色基调，恐怕是最突出的。在转型期成长的新一代学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都程度不等地打下过“旧学”的根基，又都是在鼓吹“新学”的环境中长大，频频袭来的欧风美雨在他们初受教育之际即施加了深层的影响。不独出国留学鲁迅、郁达夫等是如此，即便是当时未及赶上“出国潮”者如茅盾、夏衍等，进的也是中西合璧的新式学堂，在既读国文又学英语，既读“子曰诗云”又学“声光化电”的环境中开始他们的学习生涯^[35]。这样早早打下的底子，使他们在心理素质、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上奠定了向现代转型的底色基调。同时，他们还体认到了文学对于思想革命、精神转变的重要性。周氏兄弟就是从中国旧文学的衰微中，看到了它急需“新生”而有志于“新文学”建设者甚少，因而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了对于文学改革的直接介入。拟议创办专“治文学和艺术”的《新生》杂志，是基于此种考虑^[36]；“别求新声于异邦”，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则是其实际行动，“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37]。

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更重要的业绩是在“五四”以后，但他在留日期间已看出晚清文学改革的不彻底性，痛感“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因此热切呼唤“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38]，这实际上已在殷切期盼一场新的文学革命的到来。在此基础上再跨前一步，并将个体的精英文化思想扩展为普遍的社会文化思潮，必促成中国文化、文学思想向“现代”的全面转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严格意义上说是始于“五四”新文学革命，从那时起，文学观念、文学形态、文学语言等发生了迥异于传统文学的激变，遂有中国文学的全面转型，越文化的新变精神也得以强烈显现。严家炎先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中曾说道，“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这是对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在文学革命中的位置的精当概括。如果历数“浙军”于新文学初始阶段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大量开创性成果，那么其对新文学革命的意义就会更清晰地呈现出来。《新青年》最早发出了文学革命的强烈呼声，作为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大本营”，自有无可取代的地位。《新青年》为浙江新文学作家们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而他们也由此显示出新文学的实绩。这场文学变革，促进了文学观念、审美品格和文体形式的现代新变，深刻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越地作家的作品全面覆盖各个文体领域，且大都与《新青年》构成直接联系，仅此就足以显示越地作家在文学革命中无可取代的成就。小说方面，鲁迅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风波》等力作，不但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且把中国现代小说提到很高的位置，以至于很长时期“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39]。由鲁迅发端，后起的浙江小说家郁达夫、茅盾等相继登台，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繁盛与发展。诗歌方面，《新青年》白话诗人群体对中国新诗建设具有开拓者之功，而这个群体中浙江诗人所占比重最大，周作人、沈尹默、刘大白等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白话诗人代表，名重一时。其后，徐志

摩、艾青、戴望舒、穆旦等诗人的相继涌现，显示出中国新诗正是在浙江诗人手中逐步成熟的。散文方面，《新青年》作家群的“随感录”文体对于现代散文的创建有开拓之功，此种新文体“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其最初创作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40]。对散文文体的文学性改造卓有成效者，当首推周氏兄弟。周作人创“美文”说，要求杂感、小品成为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梁，鲁迅对杂文应进入“文学之林”有更全面系统的阐说，而“鲁迅风”与“启明风”已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两大流派。戏剧方面，《新青年》同人曾表现出对新型戏剧创建的极大关注，相继推出两个专号：4卷6期的《易卜生专号》和5卷4期的《戏剧改良专号》。早期浙江戏剧家陈大悲便是创作新剧的先行者，他最早的剧本《浪子回头》写于1914年，其地位被认为“是和胡适之在文学上差不多的，虽然他的影响没有后者远大”^[41]。后起的浙江戏剧改革者还有宋春舫，其创作的未派剧本《盲肠炎》等也属流派开山之作。20世纪30年代戏剧大师夏衍的创作，则显示出浙江作家在戏剧文体建设上的更高成就。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在文学新变时期到来之际，浙江新文学作家把握机遇，将越地积累的文化传统和文学新变精神发挥到极致，无论是其对文学形态的新创，抑或是对文本形式的改造，都为新文学奠定了基石，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全面转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越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项目编号17AZW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16] 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第10页，第11—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严家炎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中曾指出：研究新文学须“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点”，而“五四”以来从浙江走出的著名作家最多，且“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实在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讨”。参见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 [3] 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8卷,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4]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第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5]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 [6]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5页、第20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 [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2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 [8] 王文濡:《龚定庵全集·序》,《龚自珍研究资料集》,孙文光、王世芸编,第184页,黄山书社1984年版。
- [9]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97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 [10] 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1903年第1期。
- [11][38]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第51页、第56页。
- [12] 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32页。
- [13] 鲁迅:《〈嵇康集〉著录考》,《鲁迅全集》第10卷,第51页。
- [14]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9页。
- [15]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第10—1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17] 袁楠:《送周子敬序》,转引自《浙江文化史》,滕复、徐吉军等编,第30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18] 郭桓:《朱舜水》,第54页,正中书局1947年版。
- [19] 参见滕复等著《浙江文化史》,第13—1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20]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 [21][22] 参见徐和雍等著《浙江近代史》,第135—155页,第16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23] 张元济致汪康年信,《张元济书札》,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24] 项士元:《浙江新闻史》,第34页,之江日报社1930年版。
- [25] 《敬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浙江潮》1903年第7期。
- [26]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7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27]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1页、第57页。
- [28] 参见彭晓丰等著《“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第83—8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 [29]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9—10期。
- [30] 杨世骥:《文苑谈往·诗界潮音集》,转引自《中华文学通史》第5卷,张炯等主编,第351页,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 [31] 蒋智由:《维郎氏诗学论·按语》,《新民丛报》1905年第4号。
- [32] 章太炎:《序〈革命军〉》,《章太炎选集》,第1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33]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页、第547页。
- [34]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第10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 [35] 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学生时代》,第60—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36]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
- [37]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55页。
- [39]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第4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 [40]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
- [41] 向培良:《中国戏剧概评·从陈大悲到丁西林》,第18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
-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高华鑫